

（书评）《共和国的哲学家》 by Jean-Louis Fabiani, 《知识分子的诞生》 by Christophe Charle
by 兰德尔·柯林斯 (published on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在十九世纪晚期和二十世纪早期这段时间里，法国哲学并不十分活跃。在国际上最广为人知的哲学家就是柏格森，但他却没有多少追随者，也缺少对其他法国哲学家的直接影响。然而，社会学、心理学和人类学却正在当时的哲学中孕育而生。当时的文学也十分活跃，从左拉（Emile Zola）这样的自然主义小说家，到如马拉美（Stephane Mallarme）这样的现代主义反对者，乃至正在成长的新星，如普鲁斯特（Marcel Proust）。学术研究、文学和政治三者间的关系正在以一种新的方式被重组，这种方式预见了三四十年代的存在主义浪潮，以及其在六七十年代的顶峰。正是在这段世纪之交的时期，法国在整个二十世纪的辉煌智性生活被奠基了。

Jean-Louis Fabiani 和 Christophe Charle 一起沿着布尔迪厄的社会学视角，将这段形成性的时期引入视野。Fabiani 的解释展现了在1871年共和国建立后，在1880-82年天主教丧失了对教育的控制权、大众公共学校系统被建立起来后，哲学向着职业化学术的转向。然而学术哲学本身则保持着静止的姿态，仍旧以经典为旨趣。Fabiani 指出，这一保守的智性倾向不仅仅萌发于周遭的社会环境，同时还是被哲学职业的组织所催生的。那些逃逸了这一保守的智性立场的学者，恰恰处于正统的职业路径之外：实证主义者，亦即孔德或其他科学化世界图景之拥护者的追随者，要么是非-学者，要么就是在哲学之外找到了自己的容身之所（Renan 是法兰西学院的希伯来语教授，而 Taine 则在美术学院任教）；而“个体主义”的新康德主义者，如 Renouvier，也以类似的形式从哲学的学术教职中脱离出来。

人们期望单个学术哲学家就能够完整地涵盖整个领域。通常情况下，每个大学就只设立一个哲学教席。高中（Lycees），精英高级中学，也会教授哲学，它们会在学习的最后一年为学生开设哲学经典的综述课程。大多数哲学家都在巴黎的精英教育学校——高等师范学院（ENS）——接受训练，而在他们能够在高等教育系统中获得教职之前，必须要花几年在高中教书。柏格森就花了16年在外省的和巴黎的几所高中，然后才被法兰西学院选中；因此，柏格森从未教授过任何大学学生，因为在他的职业生涯的最后几年，它仅仅以荣誉教席的身

份向一般公众开设讲座。我们可以在三十年代的萨特那里看到类似的职业模式：从ENS毕业后，萨特首先到一个外省高中教书，然后回到巴黎的一所高中接着教书，最后才进入了巴黎的文学、剧院和政治新闻的世界。在这两个例子里，我们看到了哲学的创造力从学院体制中逃逸出来，并吸引着学院外的听众。

当然，对受训的哲学家来说，最经典的路径莫过于沿着学院内的等级制一步步晋升。从中学教师起步，人们可能晋升为政府机构的学校督学、统考的管理者，或者成为授予高等学位的评审委员会成员。在这样的职业路线上的成功，不仅意味着其依附于一种保守的智性立场，也意味着把学术活动约束在关于经典的手稿、翻译和编辑活动中；相比之下，发表得少或根本不发表则是可以接受的。

这种学院哲学之所以具有吸引力，是因为它自己把自己刻画为诸学科领域之首，即能够将学生所学习的其他所有学科的智慧聚为一体那个学科。只要哲学仍旧是高级中学课程方案中最末的必修课，那么这种合法性就会继续维持下去。鉴于精英高中总体上还是关注人文知识，强调修读古典语言、历史和文学，哲学于是就把自己划归为反自然科学的保守立场——自然科学自天主教控制教育以来就被排除在这种教育体系之外了。但在药学、化学和其他科学领域里已经产生了令人瞩目的进展，在这一世纪之交，已经有接连不断的声音要求把人文学科和哲学的这种优势位置解除，并改革培养方案。哲学家们聚在一起为他们的领域辩护；他们中的很大一部分人要么投身入灵性论（Spiritualist）的阵营，抵抗科学思潮而高举主观主义与观念论的旗帜，要么就采取了一种批判的立场，主张对于知识的不可知论（against positive claims to knowledge）。柏格森的创造性是这场运动中最广为认知的努力。

科学/反科学的斗争也在哲学家团体内部进行着。在十九世纪的七八十年代，哲学系学生中最有抱负的那些人，例如 Theodule Ribot, Alfred Binet, Pierre Janet, Emile Durkheim 和 Lucien Levy-Bruhl, 将他们的志趣和方兴未艾的自然科学绑在了一起。传统的哲学教师在他们眼里变得无趣，他们转而探索如何在现有的哲学基础上开拓新的科学领域。这种抱负被 Fabiani 解释为是受他们的家庭背景所影响；社会科学的创造者通常来自外省的、有高度文化资本的家庭——教师、医生、拉比；而主张灵性论的哲学家更有可能来自巴黎的、有高度经济资本和人脉关系的家庭，例如在商业世界或文学世界当中。

到了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学术世界开始得到重新组织。哲学发生了分化。一方是企图以历史的、非技术的方式来维系经典之优势地位的学术部门。在这一方那里，不会有任何给逻辑学家与反形而上学者对抗的机会，即便这类对抗即将在英格兰和维也纳爆发；也不会有任何与逻辑实证主义或日常语言哲学相当的思潮在法国发生。而在另一方，一种科学的创新冲动催生了特殊化的社会科学，亦即反形而上学的社会学、心理学和人类学；尽管它们也处理一些传统的哲学议题，例如认识论和心灵，但处理的方式是经验的/实证的，也避免了英国和维也纳的逻辑学家的技术装置。除了这两方以外，还有一个第三翼，由反实证主义者构成，但是他们将其原本来自灵性论的根源移置到了一种对抗性的反现代主义当中。这一脉的哲学家放弃了受尊敬的官方职业，转投到了文化知识分子中去。这里，我们看到了或许是二十世纪法国智性生活中最突出、最具影响力的特质的诞生，即知识分子职业的去专业化——放弃十九世纪教授式的优越，来换取另一种生活，一种和更激动人心、更断片式的文化新闻记者身份相捆绑的生活。

如我们在 Charle 的书中所见，如此这般构成的“知识分子”身份在两个维度上是矛盾的。一个矛盾是学术和非-学术的对抗，第二个则是关乎政治的。尽管在六十年代的影响下，我们倾向于理所当然地认为知识分子总是左翼分子，但从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这段历史告诉我们，知识分子的政治立场总是有可能在另一端，甚至包括极右翼。德雷福斯事件在1898年爆发，其余波影响到了二十世纪早期，就曾把知识分子分别动员到左翼和右翼。

对德雷福斯的辩护（自由派/左翼分子对政府和军队的批评）有一部分是从学术世界中申发出来的：主要是来自哲学和历史，来自语言学和自然科学的声音相对较少；而反对德雷福斯的声音（保守的国家主义者，经常是天主教徒和反犹主义者）则更多来自法学、政治管理、医学和经济学。这体现了一种划分，一边是更加自治的、学术导向的院系，另一边则和实践的职业成就相捆绑。在那些文人或反学术的知识分子当中，左翼/右翼的区别体现在这两方之间：一方是年轻的、少有发表机会的德雷福斯拥护者，另一方是资历更老的、更出名的反德雷福斯的作家，他们有足够的收入来负担布尔乔亚生活。但反对德雷福斯的声音也包括一些前卫的文人群体，他们是无产阶级新闻记者，得依靠在流行报纸和昙花一现的小杂志上发

表来谋取生机。因此，左/右派的分野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知识分子是自治的、面向自身群体的（可能因为他们在学术上取得成功，或者因为他们作为文学志向者被隔绝于波希米亚生活中），还是相反地依附于主导秩序（同样有两种形式：作为成功的专业人士或作家，或者作为在大众传媒需求下艰难谋生的无产阶级）。

如 Charles 所论，那个时候的知识分子世界已经就精英主义这个问题而分裂了。不论是学术世界还是文学世界，都已经基于名誉和声望产生了分层；然而两个世界也都或多或少在其中中心身份中强调文化相对于其他纯粹物质或社会优势的更高地位；两个世界都看中所谓的创造性和“优绩”。但不论是创造性还是优绩，无不具备内在矛盾，即一种发生在追求者、失败者、成绩平平者与享有最高荣誉的明星之间的、隐形的阶级斗争。在世纪之交的法国，学者们俯视着新闻记者和流行作家，视他们为无能的商业写手；而反过来，在商业世界中谋生的作家们指责学者为缺乏社会价值感的精英主义。两种观点都认为对方没有原则、有不平等的优越感。

在这一切的背后，是一种结构转型。由“文人”、“智者”、“诗人”在十九世纪早期组成的活跃的、富有学识的小团体，被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后出现的那个庞大的、竞争性的、差异化的文化资本市场所替代。一方面，这个流通着畅销书和报纸的市场把慷慨的收入给予一小部分人，而对多数人十分吝啬；另一方面，大学学者和高级中学教师变得越来越多、越发封闭，也不再如以往那般受人崇敬。那些转而浪漫化那个保守的历史的智识性职业团体——医生、律师、外省学校的教师以及有抱负的小说作家——正在变得愈发现实：他们清楚地看到，文凭的过度授予正在削弱其职业的精英地位。因而，他们对自由主义者平等主义意识形态的攻讦，正是其自身利益的反映。

正是在这里，我们发现了和布尔迪厄在《学术人》中对六十年代的分析相平行之处。在所有这些分析中，学界的非特权部门的扩张造成了向巴黎文学和新闻界“无产阶级”群体的溢出，导致了多方的不满。也是在这三个作者的分析中，学术部门和有更成功的媒介形象的部门占据了矛盾的位置，同时构成了体制和反体制的角色。如 Fabiani 所指出，近来的“后现代主义”思潮正是在和一个世纪所相似的结构冲突里运作的。鉴于知识商品的流通市场总是起伏不定的，这种斗争似乎就是法国智性生活的一个长期特征。